

两晋之际士族移徙与“门户之计”浅论

杨 洪 权

作 者 杨洪权, 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, 武汉, 430072

关键词 两晋 士族 门户 迁移

提 要 士族乃汉末魏晋形成的一特殊阶层, 他们在晋末大乱时保家护宗、发展势力所凭据的是当时自身的门第。一流高门皆择南迁, 次等家族多留北方。乱世分宗, “以冀遗种”, 为士族共识, 王衍“三窟”用意在此。“门户之计”使留、迁于北方的士族抛弃“华夷之辨”, 苦心择人, 抓机遇, 仕异族, 经历坎坷。或正因此, 他们比南迁士族更具生命力。

晋怀帝永嘉元年(307)11月, 司徒王衍进言于执政司马越: “中国已乱, 当赖方伯, 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”^①得到司马越首肯后, 衍以弟澄为荊州都督, 族弟敦为青州刺史, 对二人言: “荊州有江、汉之固, 青州有负海之险, 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, 足以为三窟矣。”^②此即为遭人唾骂的王衍“狡兔三窟”之计。其实, 西晋“八王之乱”后, 随即“永嘉之乱”, 保门户乃当时士族共同倾向, 王衍“三窟”之计为时代产物。

自汉武帝独尊儒术, 某些家族以通经显达, 世代相承, 形成独特社会地位。汉末大乱, 人士流移, 曹魏实行九品官人法, 大族地位升降与时局相关。在曹、马之争中, 投向司马氏的家族, 地位巩固、提升。西晋时, 中央高官已为河东裴氏、太原王氏、琅琊王氏、弘农杨氏、颍川荀氏等几大家族控制^③。这些家族培植势力, 排斥异己, 几乎垄断朝政。家族利益日渐重要。晋武帝苛于微官, 族纵高官^④, 这更便于士族发展家族利益。“八王之乱”爆发, 实亦由家族利益导致。杨皇后为保杨家地位, 死前让武帝纳其叔父杨骏女杨芷。杨芷被立为后, 杨骏因得辅政。杨骏贪权失策, 惨遭灭门。贾充外孙贾谧怕太子司马继位后不相容, 贾、韩门户不保, 劝皇后贾南风杀太子^⑤, 致皇储空缺, 宗室王问鼎, 乱事升级, 国力衰竭。

“八王之乱”使许多家族更注意保护自己。参加变乱为各方镇宗室王出谋划策冲锋陷阵者, 或为出身低微、欲出人头地者, 如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, 河间王司马的大将张方; 或为吴亡后一直受歧视、仕途不畅的江南士族, 如效力于成都王司马颖的陆机、陆云兄弟。最后, 东海王司马越夺得朝政控制权, 也独吞了“八王之乱”造成的所有恶果。当时洛阳常受刘渊

军队骚扰，大河南北州郡牧守屡遭攻击，他们逃离本职时，多选安全去处，因而大量官吏逃往江南、东北、西北。洛阳的屏障一一丧失，处境更加孤立。住洛官吏也纷纷出逃。《晋书·卫传》言：

以天下大乱，欲移家南行。母曰：“我不能舍仲宝去也。”启谕深至，为门户大计，母涕泣从之。临别，谓兄曰：“在三之义，人之所重。今可谓致身之日，兄其勉之。”乃扶舆母转至江夏。

卫为门户大计，与兄分开，扶母南迁。

《晋书·文苑·庾阐传》略云：

颍川鄢陵人也。少随舅孙氏过江。母随兄肇，肇为乐安长史，在项城。永嘉末，为石勒所陷，阐母亦没。阐不桷沐，不婚宦，绝酒肉，垂二十年，乡亲称之^⑥。

庾阐过江，母兄滞项，结局大不一样。这种兄弟分开，或南或北的事例当有很多，只是王衍利用职权，让兄弟分居要地，而卫、庾肇类官吏只能自谋出路。执政司马越征兵全国，却无一军勤王，家族利益使诸侯征镇抛弃了飘摇中的西晋政府。司马越自感洛阳难保，也调洛阳主力部队回东海国，大批官吏随之南逃。而越病死途中，这批人被石勒追及于苦县，王公以下10余万人被杀，王衍被排墙压死。洛阳不久陷落，以它为依托的许多家族或亡或迁，王衍此“窟”不复存在。

洛阳陷落后，北方可立足据点不多。被拥立于长安的晋愍帝，受刘曜不断攻击，弹尽粮绝，被迫出降。依靠他庇身保家的关中大家族受沉重打击，有些家族便迁往河西。效忠晋室并不安全^⑦，许多人便为门户计而转变观念，为晋室守节者日趋寡鲜。石勒占邺城后，问张宾抚邺人选，宾荐西晋前东莱太守南阳赵彭。石勒征彭，署为魏郡太守。彭见勒而辞曰：“臣往策名晋室，食其禄矣。犬马恋主，切不敢忘。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，亦犹洪川东逝，往而不还。明公应符受命，可谓攀龙之会。但受人之荣，复事二姓，臣志所不为，恐亦明公之所不许。若赐臣余年，全臣一介之愿者，明公大造之惠也。”^⑧石勒默然。宾曰：“自将军神旗所经，衣冠之士靡不变节，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。至如此贤，以将军为高祖，自拟为四公，所谓君臣相知，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，何必吏之。”^⑨石勒转喜，赐赵彭安车驷马，养以卿禄，辟其子明为参军。彭未再仕，却实附勒。此即为“门户之计”。彭未仕勒，亦与“华夷之辨”有关。渤海高瞻与其类似。

高瞻永嘉乱后回乡，与叔父高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，依王浚。后又依崔毖。毖败，瞻随众降慕容。敬其姿器，欲重用他，他称疾不起。抚其心曰：“君之疾在此，不在余也。……君中州大族，冠冕之余，宜痛心疾首，枕戈待旦，奈何以华夷之异，有怀介然。且大禹出于西羌，文王生于东夷，但问志略何如耳，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！”^⑩瞻仍辞疾笃，深感不平。平原宋该劝杀瞻，瞻知后，以忧死。瞻本为保家护宗而北徙，固执“华夷之辨”，自身忧死，其族人必为身家门户改变观念。“衣冠之士靡不变节”，乃时局使然，他们要为门户考虑。见于《晋书·忠义传》。西晋灭亡时不屈之臣仅允、焦嵩、贾浑、辛勉几人。王育受命促刘渊率部援邺，为渊拘留，任渊太傅；韦忠号称志不可夺，拒裴頠推荐。张华辟举，为刘聪镇西大将军、平羌校尉；刘敏元永嘉乱后由家乡西投愍帝，后为刘曜中书侍郎、太尉长史^⑪。皇帝尚且投降，大臣效忠何人？皇帝屈事异族，大臣何必守“华夷之辨”！

长安外，刘琨所据并州与王浚所控幽州，亦避乱者投依处所。《晋书·刘琨传》称

“(刘)琨父蕃自洛赴之,人士奔进者多归于琨。琨善于怀抚,而短于控御,一日之中,虽归者数千,去者亦以相继。”后为刘聪所迫,“诸避乱游士多归于(王)浚”^①,浚对众多投依者不能存抚,且政法不立,士民又纷纷离去。广平游邃、北海逢美、西河宋 都曾为昌黎太守,又都曾避乱于蓟,后投慕容 。王浚多次写信召游邃兄畅,畅欲前往,邃曰:“彭祖(浚字)刑政不修,华戎离叛,以邃度之,必不能久,兄且磐桓以俟之。”畅曰:“彭祖忍而多疑,顷者流民北来,命所在追杀之。今手书殷勤,我稽留不住,将累及卿。且乱世宗族宜分,以冀遗种。”^②畅后与浚一同覆没。魏郡斥丘人黄泓,永嘉乱后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。他对瞻曰:“王浚昏暴,终必无成,宜思去就以图久安。慕容 法政修明,虚怀引纳,……宜相与归之,同建事业。”^③瞻不从,泓便自率宗族归 ,为 参军,历仕慕容 暉、 苻,建功立业,仕途显达。平原宋该、杜群、刘翔,先依王浚,后依段氏,以为皆不足托,便率流寓之士归慕容 。安定皇甫坚拒绝任王浚妻舅东夷校尉崔毖长史,与弟真也投奔了慕容 。乱世择主,士民为保身家门户而来,既不足托,自当另择。士族“为门户计”必寻可靠托身地。曾任昌黎太守的裴疑,在任玄菟太守的兄长裴武去世后,与武子开载丧回乡。到辽西后,道路梗塞,裴疑欲投慕容 。裴开说:“乡里在南,奈何北行!且等为流寓,段氏强,慕容氏弱,何必去此而就彼也!”疑曰:“中国丧乱,今往就之,是相帅而入虎口也。且道远,何由可达!若俟其清通,又非岁月可冀。今欲求托足之地,岂可不慎择其人。汝观诸段,岂有远略,且能待国士乎!慕容公修行仁义,有霸王之志,加以国丰民安,今往从之,高可以立功名,下可以庇宗族,汝何疑焉!”^④开听从叔父意见,随其投依慕容 。

裴氏为河东大族,朝野皆有势力。司马越妃裴氏与重要谋士裴盾皆河东裴氏。裴妃在逃出洛阳前往东海国途中,兵败遭劫,后辗转至建康;裴盾为徐州刺史,彭城被刘渊大将赵固、王桑攻击时,盾为长史司马奥所诱,降赵固,后为固杀。裴宪亦出河东裴氏,西晋末任豫州刺史,受石勒、王弥攻击南投江州刺史华轶。他与华轶不受琅琊王司马睿指令。华轶为睿攻杀后,宪逃奔幽州,王浚用为尚书。石勒以其清廉,用为从事中郎^⑤。裴妃为裴盾妹,盾为裴楷次兄裴康子,裴宪为楷第三子,楷为裴秀从弟,该家族与琅琊王氏俱盛于魏晋之世^⑥,其家族成员在西晋末丧乱时,皆选择南下。裴宪先南下,立足不住才北投。裴疑一族亦出河东闻喜,但社会地位不如裴秀族,故天下乱时,“疑兄武先为玄菟太守,疑遂求为昌黎太守”^⑦,他们选择东北地区为避乱保家处所。此与卫 移家南行以保门户,恰成对照。

与裴宪同为魏晋高门的荀绰,未南下而依王浚亦属特例。荀绰为葛勛孙,其叔父藩、组在西晋末皆居高位,洛阳陷落后奔密县。王浚承制,奉藩为留台太尉,以组为司隶校尉^⑧。荀绰依浚盖与此有关。藩子邃 与组皆渡江。荀氏或南或北,亦有“乱世分宗,以冀遗种”意。

慕容 诚心待贤,吸引了大量关内士人,此既表明“为门户计”的诸多家族择人恰当,亦预示慕容 及其子孙能昌盛发达。由慕容 所立统流人郡:冀州人为冀阳郡,豫州人为成周郡,青州人为营丘郡,并州人为唐国郡^⑨,可见流亡士庶归附之多。

有些家族一旦托身,便几世不移。如渤海封氏,自封释任东夷校尉,死前以孙奕托慕容 ,释子冀州主簿俊。幽州参军抽至辽东奔丧,因道路梗阻,丧不得还而留仕慕容 。以抽为长史,俊为参军,封氏即为慕容氏辅臣。俊子放任慕容 苻吏部尚书;放子懿为慕容宝中书令、户部尚书,另一子孚为慕容宝吏部尚书,慕容德左仆射,慕容超太尉。几代人在前、后、南燕身居要职,南燕兴亡与封氏关系尤为重大。封懿且撰《燕书》,流行于世^⑩。

“为门户计”，可托身，便就近托付；虽异族，待贤心诚，亦乐投依。众多士族投慕容当缘此。这种汉族士人与异族酋帅的结合，对于少数民族汉化加速民族融合极为有利。裴嶷、黄泓投慕容，不仅为庇宗族、图久安，且有建事业、立功名意图，此必利于提高家族地位。

西晋末北方战乱，军阀残暴，众多士族南迁。当社会安定，秩序恢复，入主中原少数民族酋帅需士族协助统治时，“为门户计”而南迁士族中便有人返回故土。该现象可于后赵看到。

石勒起兵初，大杀西晋官吏，豪门大族对其望而生畏，因而石勒启用士人，他们往往逃避。如晋东莱太守赵彭婉言谢绝石勒委任；王浚从事中郎阳裕避勒潜逃，远投段眷^①。此时石勒所设“君子营”，有以衣冠人士为质任因素^②。石勒灭王浚、刘琨后，始转变政策，他下令“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”、“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、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”；又“清定五品，以张宾领选，复续定九品，署张班为左执法郎，孟卓为右执法郎，典定士族，副选举之任”^③承认士族地位及特权。因而“为门户计”流寓他乡的士族，有人便重回故土。如范阳李产。同郡祖逖拥众部于南土，力能自固时，李产前往依附。后知祖约有志，会对身家不利，北方又趋安定，便率子弟十几人秘密返乡，仕于石氏，为本郡太守。慕容南征，他降于军门。嘲之曰：“卿受石氏宠任，衣锦故乡，何故不能立功于时，而反委质乎！烈士处身于世，固当如是邪？”^④产以天命有归，力屈势穷，只为“归死，实非诚款”相答，博得好感，被擢用，历位尚书。产子续弱冠为郡功曹、州主簿、前燕太子中庶子。李产固辞太子太保时谓子续曰：“以吾之才而致于此，始者之愿亦已过矣。”^⑤诚如所言，以李产家世地位，在东晋必与尚书无缘；依附祖约，尚有覆宗之忧。所以，“为门户计”，李产返乡为一明智抉择。

前文谈到，西晋中央政权已为几大家族垄断。东晋政权实为洛阳集团在江南的移植，因此，西晋的一流士族在东晋依然高居权力之巅，次等士族也身份依旧；没有特殊机缘，这种格局很难变动，由此决定了许多家族的选择。当高门大族大都南迁时，次等士族基本在江北迁移以寻托身地，或扎根本土，结坞自保。不作迁移的家族当认为，与其作前途未卜的南迁，仍被挤于核心统治圈外，不如留居本土更踏实。因为只要自己拥有势力，任何入主中原者都需要他们，如此则上可建功立业，下可保家护宗，这必然更有利家族门户发展，如清河崔氏即是。崔悦在石虎末年为新平相，其子崔潜仕慕容皝，为黄门侍郎；另一子崔液又仕苻坚，为尚书郎。淝水战后，关中大乱，崔潜子宏与崔逞、郝晷、张卓、夔腾、路纂皆避乱降晋，得任冀州诸郡太守。他们各率部曲在河南经营，后受翟钊官爵，钊亡，又降后燕，被慕容垂随才叙用^⑥。北魏灭后燕，崔氏再降拓跋氏，发展成北朝一流高门，直至唐朝仍以门第自矜。显然，清河崔氏在石赵末年、前秦淝水败后皆可南下，而他们并未离开动乱的北方，依然留仕各异族政权，发展为北朝一流高门。前引渤海封氏例，与此相类，个中原因值得深思。如所周知，王睿为灭吴首功之臣，因得罪太原王氏，结怨强宗，子孙过江亦不见叙录。过江士族在东晋又分先后，杨氏全期出自弘农杨氏，自云门户承籍，江表莫比，因过江晚，常受排抑，他为此慷慨切齿^⑦。此类情况，也使北方一些士族虽在改朝换代时有机会南迁，但仍宁愿留于北方，经受动乱苦痛、兵燹忧患，结坞自保，以俟世清。

右北平无终人阳裕的经历，可助我们了解当时士族心态。阳裕先为幽州刺史和演主簿，王浚领州，转治中从事，忌不能任。石勒克蓟城，访幽州人士，枣嵩荐裕，称其有干事之才。石勒想用他，他微服潜遁。鲜卑单于段眷雅好人物，虚心招裕。裕对友人成泮说：“仲尼喜佛之召，以瓠瓜自喻，伊尹亦称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，圣贤尚如此，况吾曹乎！眷今召我，岂

徒然哉!”泮曰:“今华夏分崩,九州幅裂,轨迹所及,易水而已。欲偃蹇考槃,以待大通者,俟河之清也。人寿几何?古人以为白驹之叹。少游有云,郡掾足以荫后,况国相乎!卿追踪伊、孔,抑亦知机其神也。”^①裕应段眷,受拜郎中令、中军将军,处上卿位,历事段氏五主,甚见尊重。段辽与慕容皝相攻,裕谏不从,出为燕郡太守。石虎克令支,裕以郡降,拜北平太守,征为尚书左丞。后随麻秋迎段辽,兵败被俘。慕容皝释其囚,拜郎中令,迁大将军左司马。皝东破高句丽,北灭宇文归,裕皆参其谋。裕又用其建筑才智,为皝规划了新都龙城。

阳裕与友人成泮的对话表明:第一,士大夫已转变观念,为效力异族找历史依据。第二,人生短暂,欲有作为,不能俟河之清。第三,“郡掾足以荫后”,欲保门户,必须入仕控制局势的少数族。此盖北方士族出仕各异族政权的动机。裕避勒投段,重用程度当为考虑因素;后降石虎,当由石虎选官遵魏晋九品之制,东徙雍、秦望族尚“一同旧族,随才铨叙”^②,他感到身家可保,仕途无阻。范阳卢谌常赞阳裕:“吾及晋之清平,历观朝士多矣,忠清简毅,笃信义烈,如阳士伦(裕字)者,实亦未几。”^③阳裕生性谦恭清俭,所仕之国,皆竭心尽力,此即“忠清简毅,笃信义烈”,至于是否尽节一姓,则并不为时人看重。此乃时势使然,为乱世“门户之计”与各政权求士必由之路。

《晋书·孝友传》为我们提供又一北方士族保门户例证:

桑虞字子深,魏郡黎阳人也。父冲,有深识远量,惠帝时为黄门郎。……虞诸兄仕于石勒之世,咸登显位,惟虞耻臣非类,阴欲避地海东,会 母忧,遂止。……五年后,石勒以为武城令。虞以密迹黄河,去海微近,将申前志,欣然就职。石季龙太守刘征甚器重之,征迁青州刺史,请虞为长史,带祝阿郡。征遇疾还邨,令虞监行州府属。季龙死,国中大乱,朝廷以虞名父之子,必能立功海岱,潜遣东莞人华挺授虞宁朔将军、青州刺史。虞曰:“功名非吾志也。”乃附使者启让刺史,靖居海右,不交境外。虽历伪朝而不豫乱,世以此高之。卒于官。

桑虞执“华夷之辨”,但为避地海东以达保家目的,他出任石勒武城令,又为石虎青州刺史刘征长史。石赵末年大乱时,他实握青州之权,但他拒绝东晋招诱,不豫乱事。“功名非吾志也”,正表达了其保家护宗心愿。“世以此高之”,标明其行为得到时人赞许。该例也向我们暗示了东晋何以屡次北伐终究无成的原因之一——北方士族为保家护宗并不支持北伐。

“为门户计”,南迁士族与北方士族相比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桓彝初过江时对周 所言“我以中州多故,来此欲求全活”^④为人熟知,他们本即为门户大计南迁。因此,东晋一直为几大家族与司马氏共天下,先“王与马共天下”,继“庾与马”、“桓与马”、“谢与马”,皇权软弱无力^⑤,侨姓士族间、侨姓与吴姓士族间互相掣肘,共同维持东晋政权。士族最关心的是家族利益,是如何保护和提高家族地位。他们的所有作为,几乎都绕此进行。此处不予展开。

总之,经历战争与政变洗礼的士族,两晋之际更注重家族利益。“为门户计”,许多人利令智昏:外戚杨氏门灭;后党贾、韩族覆;第一家族司马氏内讧等等。为储君而厮杀连年终致西晋国力衰竭。为自身利益,在“巨猾滔天,帝京危机”时,“诸侯无释位之志,征镇阙勤王之举”,致“君臣窘迫,以至杀辱”^⑥。士族们为身家考虑,身居高位者如王衍有“三窟”安排,一般大族或南或北,乱世分宗,“以冀遗种”。

“为门户计”,不同门第选择不同:一流家族,大都南迁,他们在东晋仍居权力之巅;次等家族审时度势,多留北方,他们或在为官地就近投依,或留于本土寻求发展。

“为门户计”是晋末大乱后南北士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，但南迁士族只需平衡侨姓士族间、侨姓与吴姓士族间关系，固有的社会地位使之保全门户相对容易；而留、迁于北方的士族，则需抛弃“华夷之辨”，选择可托之人，抓住机遇，历仕各异族政权，经受动乱苦痛、覆宗忧患，崎岖坎坷，以俟世清。或正因为如此，留、迁于北方的士族，比南迁士族有更强的生命力，他们家族门户社会地位一旦确立，便持续时间更长，消亡更缓慢。

注 释：

- ①② 《晋书·王戎传附衍传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 86 晋怀帝永嘉元年（307）。
- ③ 参《晋书·裴秀传》、《晋书·王沈传》、《晋书·荀勖传》、《晋书·杨骏传》、《晋书·王浑传》、《晋书·王戎传》。
- ④ 《晋书·良吏·胡威传》：入为尚书，加奉车都尉。威尝谏时政之宽，（武）帝曰：“尚书郎以下，吾无所假借。”威曰：“臣之所陈，岂在丞郎令史？正谓如臣等辈，始可以肃化明法耳。”
- ⑤ 《晋书·杨骏传》、《晋书·后妃传上》、《晋书·贾充传附谧传》。
- ⑥ 《晋书·文苑·庾阐传》原文“母随兄肇为乐安长史，在项城。”“肇”后当漏一“肇”字。
- ⑦ 《晋书·怀帝纪》、《愍帝纪》所载庾珉、辛宾等被杀事。
- ⑧⑨ 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上》
- ⑩⑪ 《晋书·慕容 载记》
- ⑫ 以上数例，皆见《晋书·忠义传》。
- ⑬ 《晋书·王沈传附浚传》
- ⑭⑮⑯ 《资治通鉴》卷 88，晋愍帝建兴元年（313）。
- ⑰ 《晋书·艺术·黄泓传》；《资治通鉴》卷 88 言黄泓为庐江人。
- ⑱ 《晋书·裴秀传附宪传》、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上》，《资治通鉴》卷 87 晋怀帝永嘉五年。
- ⑲ 《晋书·裴秀传》
- ⑳ 《晋书·慕容 载记附裴寔传》
- ㉑ 《晋书·荀勖传附绰·藩组传》
- ㉒ 《晋书·慕容 、 韦、宝、超载纪》、《北史》卷 24《封懿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 87 晋怀帝永嘉五年。
- ㉓①③③ 《晋书·慕容 载记附阳裕传》
- ㉔ 《晋书·良吏·邓攸传》：（石勒）以（攸）为参军，给车马。勒每东西，置攸车营中。……石勒过泗水，攸乃斫坏车，以牛马负妻子而逃。
- ㉕ 《晋书·石勒载记下》
- ㉖②⑧ 《晋书·慕容 载记附李产传》，按《资治通鉴》系李产返乡于晋元帝太兴四年（321）。
- ㉗ 《晋书·苻坚载记下》、《魏书·崔玄伯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 108 晋孝武帝太元十七年（392）。
- ㉘ 《晋书·王 睿传》、《晋书·杨 全期传》、《晋书·桓玄传》。
- ㉙ 《晋书·石季龙载记上》
- ㉚ 《晋书·王导传》
- ㉛ 参见田余庆先生《东晋门阀政治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。
- ㉜ 《晋书·愍帝纪》

（责任编辑 吴友法）